

## 重探柳亚子与胡适的新文化运动论争

石任之

1917年的南社内部唐宋诗之争因为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人物的介入而趋于复杂,作为论争中心人物的柳亚子,其诗歌崇尚明显带着政治倾向。新文化运动对文体变革的急切,已经容纳不了传统文学内部的革新。胡适对传统文学决绝式的告别,彻底抽身出来,建设新正统,无疑是文学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

1917年发生在南社内部的唐宋诗之争,因其发生点在新文化运动爆发的前期,其介入者多了胡适等新文学因素,颇为引人注目。<sup>(1)</sup>作为这场论争中心人物的柳亚子,因为诗歌崇尚问题和社友失和,导致南社的解体,其得失正未易言。

### 一、文体本位论:新文化运动与南社的改造文体之争

在这场论争的前期,南社社友傅尊致书柳亚子,已感“西欧自进化说昌,科学日盛,所谓文明者,适成自杀之资。将见更数十百年,必有幡然改悟,希望和平,藉吾国之文明以沾溉之一日。”<sup>(2)</sup>判断傅氏此语的基本意见,科学昌盛,文明却成杀人的利器。现代性危机所带来的恶果,傅尊已给出了判断,以本国固有的文明为主体才是解决之端。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期,山雨欲来风满楼,而作为文明载体,承载高妙精神的文字,在胡适眼中已经有了“活文字”和“死文字”之分,“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腊、拉丁,非日用之语言,已陈死矣。”<sup>(3)</sup>南社是诗界革命大旗下的革命文学团体,而在新文学者眼中,他们不新不旧,做的只是半死文字,南社一流人“淫滥猥琐,亦去文学千里而遥”<sup>(4)</sup>。古文只能创造“死文学”,真文学是胡适所推崇的那些用白话创作的词曲和小说,而彼时之文坛,却牢牢地被这些“死文学”所占据。在诗坛,有同光派和湖湘诗派;在古文界,有势力影响很大的桐城派,因此文学革命迫在旦夕,“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sup>(5)</sup>柳亚子曩夕所说文学革命“所革当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而胡适文学革命所要夺取的,就是文体这个“形式”,再造文明之梦从文字开始,白话文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

胡适对于文学的态度,始终只是一个历史进化的态度。考察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可以发现胡适对进化之定义更适合用“演进”来概括。一代又一代之文学,胡适之文学进化观不是凭空而起,忽然得出的结论。而是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相当深的渊源。在胡适的《如何可使我国文言易于教授》一

文中,胡适认为“汉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sup>(6)</sup>,在清季,无论是改良派的文学革新还是革命派文学革新思想和活动,其宗旨多在宣传教化,具有极强的政治性。这些运动实开新文化运动的先河。易峻评胡适的文学进化观时,曾云:“胡君之倡文学革命论,其根本理论,即渊源于其所谓‘文学的历史进化观念’。大意谓我国文学之流变,乃革命一次,进化一次。……夫历代文学之流变,原仅一‘文学之时代发展’,安可胶执进化之说,牵强附会,谓为‘文学的历史进化’。”<sup>(7)</sup>而如今,重新考察新文化运动的源流和胡适的文学进化观,无论是诗界革命或者清末的白话文和革命文学带来政治宣传或者普及运动,或者辛亥革命留下的政治遗产,事实上新文化运动汲取了太多传统要素,在传统和反传统之间,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李大钊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里说:“我们‘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要做两种的文化运动: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个是物质改造的运动。”改造精神,除了伦常及物质世界的认识,文化作为传统最为重要的一环,在除旧布新之中,总是作为首先要被摧颓的对象。文学之文体,如旧体诗词之形式,格律对仗,在新文化人物眼中,旧体诗词讲究形式,无异于为文字游戏。梅光迪在1916年致胡适的信中,已经表达出要改良诗界的迫切感:“吾国近时诗界所以须革命者,在诗家为古人奴婢,无古人学术怀抱,而只知效其形式,故其结果只见有‘琢镂粉饰’,不见有真诗。”<sup>(8)</sup>

文化革命与文体变革,莫不与时代互为因缘。薄古厚今或者厚今薄古,在每个时代都能找到代表性人物。从东晋葛洪“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sup>(9)</sup>到后世诗坛的宗唐宗宋风习,复古好像是诗坛的主流。其上者纵能出内入外,多数却仍是陈词滥调,充斥其中。降及清季民初,诗坛牢牢被陈三立、郑孝胥等同光派诗人所占领。词坛,常州词派还是大行其道,文坛,桐城派的势力还是牢不可破。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说:“尝谓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其下焉者,能押韵而已矣。稍进,如南社诸人,夸而无实,滥而不精,浮夸淫琐,几无足称者(南社中间亦有佳作。

此所讥评,就其大概言之耳)。更进,如樊山、陈伯严、郑苏盦之流,视南社为高矣,然其诗皆规摹古人,以能神似某人某人为至高目的,极其所至,亦不过为文学界添几件贗鼎耳,文学云乎哉!”<sup>(10)</sup>胡适认为旧文学堕落的原因,可以用“文胜质”一语包之。旧文学“有形式而无精神,貌似而神亏”。而文学革命,要从形式和精神上去除。形式上之革命,“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话。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精神上之革命,“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sup>(11)</sup>

胡适文学革命从这八事入手,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文学之基,摧颓的是旧文学的形式和内容。柳亚子对胡适的批评很不满,认为“胡适自命新人,其谓南社不及郑、陈,则犹是资格论人之积习。南社虽程度不齐,岂竟无一人能摩陈、郑之垒而夺其鳌弧耶?”<sup>(12)</sup>牢骚不满之意溢于言表,在胡适眼中,南社诗人算不得文坛主流,之所以对南社评价低,其实不是柳氏所云胡适“资格论人”。而是,胡适文学革命的目的,在于对主流文坛的争夺,能代表当时文坛主流的,同光派、桐城派、梦窗词派而已,南社距离主流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思想进步文学进步不一定能引领革命团体,以文字作为政治宣传的手段,在影响力和正统性上,和上述渊源有自的三家文坛时代风会,南社处于不新不旧之间,所以其在新旧文坛的交锋中地位尴尬。形式旧,又不能完全遵循旧式审美,甚至要以新精神去反对某些旧传统;思维新,但在胡适看来却又只是在旧形式内的翻新,并不能依靠自身打破旧的形式,也远远谈不上革命。万象更始,再造文明,这才是胡适最终的目的。文学也是改良社会的手段,晓谕社会,能改造闭塞的精英文学,从死文字走向活文字,这才能使文章保持活力。

## 二、文学进化观:文学革新与新文化运动潮流

无须讳言,胡适的文学革命带有很强的功利观,可是旧传统里生出新传统最终还是落入形式一流。只有从形式和内容上彻底更新,才能造出一个新的文体。这就是凿窗和毁屋的区别。但开风气不为师,这

种魄力,受传统文化影响颇深的柳亚子是感觉不出来的。柳亚子在运动时期反对胡适的文学革命,认为文学革命“所革当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两言尽之矣”。<sup>(13)</sup>可见其对胡适文学革命,还没有深刻意识到背后的特殊意义。柳亚子也是强烈反传统思想的人物,他读过陈独秀编的《新青年》杂志,和陈独秀也是旧识。曾经称赞陈独秀在杂志上发表的《非孔》诸篇,“先得我心”<sup>(14)</sup>。其所云理想,是思想上的革新,旧瓶装新酒。形式宜旧,其实还是保持诗词的格律、对仗、用典。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完全由儒家思想牢笼。柳亚子仍是旧式人物,他对非孔的心有戚戚,也是在旧文化内部看视旧文化。胡适却是从借来的西式哲学视角看待旧文化的,柳亚子并未真正搞懂胡适的本意,是在于打破一切旧传统,建立新天地,再造文明。南社这样半新不旧的团体,事实上也在胡适受除的范围之内。这一点柳亚子毫无意识。南社社友成舍我在《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支持柳亚子“形式宜旧,理想宜新”的文学主张,反对新文化运动。在这篇名为《余墨》的文章里,成舍我云:“亚子论文学,谓格调宜旧,理想宜新,此诚不磨之论。譬之于国,中国格调也,专制共和,理想也。谓中国须由专制改共和可也。谓中国须改为英国,或改为法国,则又乌乎可哉!此足与亚子之论互相发明也。”<sup>(15)</sup>这其实是共通了政治上的中国本位论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本位论。

中国传统文学并非一成不变,在自我内部框架中也有其流变发展。一个时代的兴盛,有其运气所钟。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但是诗歌古文,流衍千年,不绝如缕,实为传统文化精粹之所系。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言里说:“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越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sup>(16)</sup>在传统文论语境中,文学一个束缚于道统与文统之间,在“文以载道”和“诗言志,歌咏言”里打转。文坛豪杰开拓的新世界后人观之则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对这个问题解说的最为通透的是清代的易学大师焦循,他提出“一代又一代之所胜”的观点,认为“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

耳”。<sup>(17)</sup>胡适在《中国近一千年是停滞不进步吗》演讲里说:“在文学方面,唐代出了一些真正伟大的诗人和几个优美的散文作家。但是没有史诗,没有戏曲,没有长篇小说,这一切都要在唐代以后很久才发展起来。最早的伟大戏曲出现是在十三世纪,伟大的长篇小说是十六、十七世纪。抒情的歌、戏曲、短篇故事、长篇小说,这种民间文学渐渐大量发达,构成近代中国文明历史最重要而有趣味的一章。”<sup>(18)</sup>可见,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并不是仅仅厚古薄今,认为今胜于古,而是对文类新类的兴盛带来文学解放再三致意。

诗歌古文到了清季民初,文体有了新的需求,不再是精英阶层的雅言自用体。陈子展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评价这一时期的文学:“总之,这个时期的旧诗人,无论他的诗学宋,学唐,学六朝,学汉魏,乃至学《诗》《骚》,无奈他们所处的时代,总不是周、秦、汉、魏、六朝、唐、宋。他们在诗国里辛辛苦苦的工作,不过为旧诗且作一个收尾。”<sup>(19)</sup>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旧文学已日落西山,无论是宗唐还是宗宋,总囿于千百年来诗坛主流的争夺。宗唐宗宋不仅仅是审美范式的不同,更多的是承系一代士人之心史。在胡适这种留洋背景的新式知识分子看来,旧的文体已经承载不了新的内容,针对柳亚子的“理想宜新”说,胡适评价说:“(柳亚子寄杏佛书),未免有愤愤之气。其言曰:形式宜旧,理想宜新。理想宜新,是也;形式宜旧,则不成理论。若果如此说,则南社诸君何不作《清庙》《生民》之诗,而乃作近代之诗,与更近体之词乎?”<sup>(20)</sup>可见,胡适对保存旧体诗词的形式是不以为然的,晚清所提倡的“诗界革命”“白话文运动”“小说界革命”,其实其背后目的性不同,掌握的都是文坛的边缘性话语权。难以自上而下,真正打破传统的框架。文体朝向通俗的解放,其实背后既有报刊崛起之因素,又有知识分子启蒙在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很大目的是,语言文字能朝着“应用”的方向变去。古文学内部的革新运动,和文体形式抛离不断。但是,某种程度上成了新文化运动思想来源的基础。清末的白话文运动及种种文学革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新文化运动的源流。茅盾曾经说过:“解放后写的现代文学史很少对‘五四’前夜的文学历史潮流给予充分论述,私心常

以为憾。目前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主编)第一册前边,也未重视这个问题。我以为我们论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时候,应该立专章论述清末的风气变化和—些起过重要间接作用的前驱者。梁任公、黄遵宪等人的新运动(新小说运动和所谓“诗界革命”)已经在动摇着旧文学的阵脚,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替‘五四’新文学运动准备条件。至于清末的翻译西方文学和各地出现的白话小报,都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前驱,这是大家都比较重视的,现代文学史的前途也应有一定的篇幅论述。”<sup>(21)</sup>

我们追溯新文化运动的源流,可以发现,清季的白话文运动,确实直接开五四白话文学的先河。胡适自己也不讳言其白话文学实有所本,胡适说:“中国白话文学的运动当然不完全使我们几个人闹出的,因为这里的因子很复杂的,我们至少可以指出这些最重要的因子:第一是我们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作品,禅门语录、理学语录、白话诗调曲子、白话小说。第二是我们老祖宗在两千年之中,渐渐地把一种大同小异的‘官话’推行到了全国的绝大部分……第三是我们的海禁开了,和全世界文化接触了。”<sup>(22)</sup>这里面说的三个因子完全没有提到清末的白话文运动,其实在清季的白话文运动中,胡适也受到了影响,1906年胡适在中国公学时,有几位同学创办了《兢业旬报》,其主旨在以新思想灌输于未受教育的群众,系以白话刊行,胡适应邀在创刊号上撰稿,以后自己独立做了编辑。胡适后来回忆这次编辑经验时说:“我编辑这个杂志的工作不但帮助我启发运用现行口语为一种文艺工具的才能,且以明白的话语及合理的次序,想出自我幼年就已具了形式的观念和思想。”<sup>(23)</sup>《兢业旬报》是清末白话文运动涌现的大大小小的报纸杂志之一种,从中可以看出,胡适的白话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受了清季白话文运动的影响,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子。胡适的白话文学不是他在美国凭空想出来的,渊源自传统影响。胡适之所以不肯承认白话运动之影响,实际上在他看来,清季无论是提倡百花报的,还是提倡白话书的,或者是提倡官话字母、简化字母的,这些人只是“有意地主张白话”,但不可以说是“有意地主张白话文学”,在胡适看来“他们最大的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

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吧,这种态度是不行的。”清季类似白话文运动的种种倡导者,在胡适眼中,他们和传统隔离不断,主张白话只是带着宣传目的,没有魄力和见识把白话文当作主流文学来倡导,心态还是处于不平衡阶段。对胡适而言,这种运动是失败的。

### 三、论争的余响:作为文体变革尴尬人物的柳亚子

比较柳亚子和胡适对“形式宜旧”之争论,可以看出胡适的文学进化观不再是传统文学内部之循环演进,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是跳出传统的框架,无意于在传统文学内部进行变革,走往复循环的老路,而是“自作新文明”,推倒贵族文学,把文学真正改良进入大众视野。无论是诗坛的宗唐宗宋,还是词坛的梦窗词派,文坛的桐城派,总带着浓重的复古色彩。这种复古的恶影响,带来了文学上的彻底革命,白话文学争夺文坛旗帜成功,成了文坛的正宗。

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注意,还是其对旧文学产生的巨大破坏力带来的影响。胡适介入南社的唐宋诗之争,从某程度上可以看出新旧两派对立,处于中间位置的南社尴尬。柳亚子在南社唐宋诗之争时曾云:“国事至清季而极坏,诗学亦至清季而极衰。郑、陈诸家,名为学宋,实则所谓同光派,盖亡国之音也。民国肇兴,正宜博综今古,创为堂皇雋丽之作,黄钟大吕,朗然有开国气象。何得比附妖孽,自陷于万劫不复耶!其罪当与提倡复辟者同科矣!”<sup>(24)</sup>

可见柳亚子论诗不是针对诗学审美问题,而是带有强烈的政治性。然而这种政治性对于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带不来建设,只是政治性的分歧。胡适在《尝试集自序》里,就批评柳亚子的“文学革命”主张缺乏具体的进行计划,胡适说:“甚至于南社的柳亚子也要高谈文学革命,但是他们的文学革命论只提出一种空荡荡的目的,不能有一种具体进行的计划。他们都谈文学革命绝不是形式上的革命,绝不是文言白话的问题。等到人问他们究竟他们所主张的革命‘大道’是什么,他们可回答不出了。这种没有具体计划的革命,无论是政治的还是文学的,绝不能发

生什么效果。”<sup>(25)</sup> 在胡适眼中,诗歌创作的目的远非是柳亚子希望的“创为堂皇雋丽之作,黄钟大吕,朗然有开国气象”这种空荡荡的宣言,而是推倒重新建设。文化革命的目的,在于“他们老老实实在地宣告古文学是已死的文学,他们老老实实在地宣言‘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他们老老实实在地主张现在和将来的文学都非白话不可。”<sup>(26)</sup> 这种推倒传统文学的决绝和义无反顾,才是新文化运动能够成功的最大原因。

1922年,柳亚子在故乡创办《新黎里》半月刊,在发刊词里,柳亚子说:“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日新又新之说也。潮流澎湃,一日千里,吞养吐碳,舍故取新,苟非力自振拔,猛勇精进,欲不为时代之落伍者,乌可得哉?”<sup>(27)</sup> 算是相应新文化运动了。1923年,柳亚子等人发起了新南社,参加新文化运动,柳亚子在《南社纪略》里说:“在1917年(民国六年)南社因内讧而停顿以后,接着,便是新文化运动蓬蓬勃勃掀天揭地的时候。对于这一个运动,我原是同情的,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权,以至打倒孔家老店,在我都是很早的主张。欢迎德先生(民治)和赛姑娘(科学)来主持中国,我当然也是举双手赞成,剩下来的,只有打倒旧文学一点,因为习惯的关系,最初不能接受,到后来,也就涣然冰释了。”<sup>(28)</sup> 胡适和柳亚子的这次交锋,柳亚子之所以大动肝火,其实是不能容忍胡适认为陈三立、郑孝胥之流比南社的影响更巨地位更高,因此对这个评判一直耿耿于怀,曾经说过:“然而,像胡适之博士论南社,以‘淫滥’两字一笔抹杀,反而推崇海藏(郑孝胥)之流,我自然也不大心服。”<sup>(29)</sup>

然而柳亚子对新文化运动,尽管曾热烈地反对过,也曾置之不论不议之列,最后却渐渐倾向于白话文这一方面来,他解释原因是:“我觉着用文言文发表新思想,很感困难,恍然于新工具的必要,我便加入新文化运动了。”可见,终归还是走向了新文化运动的一方。

柳亚子和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关于“格调宜旧”的论争,其实背后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原因。新旧之间激烈交锋,已经容纳不了传统文学内部的革新。不再是宗唐宗宋之争,而是白话文学欲成为文坛新的正统,处在时代翻新的节点上,柳亚子从因为胡适对其评价之负气,到最后接受新文化运动,可见新文化运动演进之复杂。胡适对传统文学决绝式的告别,彻底抽身,

出来,建设新正统,无疑是文学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重探这场论争背后复杂之背景,自可窥见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演进。

注释:

- (1)关于1917年南社内部的唐宋诗之争,详见拙文《文学革命意义中的唐宋诗之争》,《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01期。
- (2)(4)(12)(13)(14)(20)(24)(27)(28)杨天石、王学庄编著:《南社史长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17页,第425页,第446页,第446页,第446页,第450页,第451页,第566页,第571页。
- (3)(5)(6)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页,第356页,第260页。
- (7)易峻:《评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学衡》第79期。
- (8)梅光迪:《梅光迪文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 (9)《抱朴子·尚博》。
- (10)(11)《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
- (15)成舍我:《余墨》,《民国日报》,1917年4月28日。
- (16)钱钟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页。
- (17)焦循:《易余龠录》,《丛书集成续编》(第91册),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463页。
- (18)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胡适演讲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 (19)陈子展:《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 (21)茅盾:《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编写方法——致节公同志》,《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 (22)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 (23)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我的信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 (25)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9·尝试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 (26)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台北远流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页。
- (29)曹聚仁:《南社巨子柳亚子》,《文坛三忆》,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79页。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涛)